

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李德民 编著

苏 燕 主审

国学基础

儒家的

孔子、孟子和道家的老子、

庄子，其思想理论往往是在特定语言

环境中针对具体问题所发表的见解，有的

是碎片化的语料集成，有的是隐喻性的寓言故

事，既错综复杂，又寓意邈深。要透过零散的材料和古奥的语言看清其思想体系，须对其原典进行

全面的梳理、翻译和重新建构。本书以孔、孟、

老、庄为结构框架，以《论语》《孟子》《老

子》《庄子》为文本支撑，以规范的白话文对译

为转换方式，按照现代学术规范对原著作者

的思想理论进行符合逻辑的编排，并通

过诠释使之成为相对完整的思想

理论体系。

清华大学出版社



国学基础



李德民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所谓“国学”主要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谓“国学基础”主要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主要是指儒道两家的理论体系。

儒家的孔子、孟子和道家的老子、庄子，其思想理论往往是在特定语言环境中针对具体问题所发表的见解，有的是碎片化的语料集成，有的是隐喻性的寓言故事，既错综复杂，又寓意遥深。要透过零散的材料和古奥的语言看清其思想体系，须对其原典进行全面的梳理、翻译和重新建构。

本书以孔、孟、老、庄为结构框架，以《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为文本支撑，以规范的白话文对译为转换方式，按照现代学术规范对原作者的思想理论进行符合逻辑的编排，并通过诠释使之成为相对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

本书适合广大青少年，尤其是国学爱好者和在校大学生阅读。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基础 / 李德民 编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302-47134-9

I. ①国… II. ①李… III. ①国学—基本知识 IV. ①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8486 号

责任编辑：施 猛 马遥遥

封面设计：常雪影

版式设计：方加青

责任校对：曹 阳

责任印制：宋 林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26.25

字 数：441 千字

版 次：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45.00 元

产品编号：075118-01



在“新文化运动”开启一百周年之际，重新审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厘清其根脉，萃取其精华，并以开放的态度进行现代化转型，以增强文化自信，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李德民

前

言



关于本书的定位与选材等比较复杂的内容问题将放在绪论中阐述，在进入阅读之前，我就本书的结构布局与表达方式等形式问题做几点说明。

一是突出文本。讲读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尊重原典，包括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文物的留存文字等。没有文本支撑，看上去非常合理的解释与发挥都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将文本读熟、读懂，才能理解原典作者的本意；只有将文本读全、读透，才能看清原创思想的体系。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尽最大可能地使用文本材料来构建每个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为了便于普及，我们选择传世经典作为讨论问题的文本，只有涉及某些具体问题时，才适当参考其他文本材料。本书阐释的重点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他们的思想分别集中体现在《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四部著作里。本书以这四部著作作为材料支撑，来阐释孔、孟、老、庄的思想体系，这是本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因此，在论述过程中，《老子》全书和《庄子》(内篇)的材料使用率高达百分之百，《论语》与《孟子》两本书的材料使用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二是构建体系。《论语》是语录体散文，《孟子》是对话体散文，《老子》是诗化体散文，《庄子》是寓言体散文。虽然它们兼属哲学著作，但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哲学论著，对当代读者而言，即使一卷在手，也很难看清各家的思想全貌。对此，本书重点对孔、孟、老、庄的原典进行了解构和重建，目的是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符合逻辑的思想体系。《论语》中的文字，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记录下来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一般认为是由曾子的学生和有子的学生搜集整理汇编而成。全书共二十章，五百余条。虽然从不同侧面反

映了孔子的思想，但是因为没有整体布局，所以很难在短时间内理清其思路、把握其体系。按照胡适先生“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的思路，我们按照现代学术规范，对《论语》二十章、五百余条的史料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将其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进行重新排列，使之成为一个能够系统反映孔子思想的完整体系。《孟子》和《老子》也是按照《论语》的解决方案处理的。与《论语》《孟子》《老子》三部著作不同，《庄子》虽然全书有三十三篇(包括内七篇、外十五篇、杂十一篇)，但是我们发现，内七篇不但可以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体现庄子的谋篇布局，而且可以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反映庄子的思想路线。只要对七篇文章的顺序稍作调整，就可以与现代学术规范达成一致。因此，在处理《庄子》文本时，我们只选择内七篇作为理论构架，并就此进行体系建设。外篇和杂篇在论述中只作为补充材料使用，而且用量极少。

三是配置翻译。《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的原文字面大都古雅深奥，晦涩难懂，容易与现代读者产生隔阂。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在原文下面直接配置译文，以增强可读性与顺畅感。译文部分以我国台湾学者傅佩荣先生的《细说论语》《细说孟子》《细说老子》《解读庄子》为蓝本，参考大量权威译注，并结合自己的体会加以斟酌而成，比较准确可靠。

四是适度解读。在重新建构的文本体系框架内，对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思想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解读。解读时注重把握两个度：一是保持与原典作者思想的吻合度，避免主观发挥；二是保持表达语意的准确度，力求一语破的。先以原典文本的自然段落为单位形成“原文—译文—解读”的格局，再用精练的小标题作为线索将各个部分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样，从点到面就形成了一个浑然的整体。

五是通俗表达。为了体现国学特色，本着通俗化与生活化的原则，选择本土化的语言表达方式，用明白晓畅的现代汉语进行阐释与评议。尽量避免使用欧化句子、概念语言和文言句式，以消除读者在时空上的疏离感。让读者接近它、喜欢它、融入它，进而找到文化认同感和精神归属感。

最后，在此对文中参考文献的作者，尤其是以傅佩荣先生为代表的译注者表示诚挚的谢意。国学博大精深，非一两人之力所能洞彻，但愿《国学基础》真的能为读者学习国学奠定基础，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反馈邮箱：wkservice@vip.163.com。

目

录



绪论

- 一、国学含义 动态考察 / 2
- 二、百家争鸣 儒道胜出 / 5
- 三、双水并流 此消彼长 / 7
- 四、天人损益 各执一端 / 10
- 五、同一学派 亦在沿革 / 12



第一章 孔子

- 导言 / 16
- 第一节 志于学 渴望长大成人 / 19
- 第二节 立于礼 打造君子人格 / 27
- 第三节 依于仁 解除人生困惑 / 41
- 第四节 达于天 实现天人合一 / 57
- 第五节 据于德 勇于道德实践 / 69
- 第六节 志于道 完成人生使命 / 89
- 第七节 从于心 获得生命自由 / 111
- 结语 / 121



第二章 孟子

导言 / 126

第一节 人性向善 为道德立法 / 129

第二节 明性择善 为生民立命 / 143

第三节 自我完善 让生命成长 / 160

第四节 与人为善 让生命闪光 / 177

第五节 止于至善 让生命圆满 / 201

第六节 王道乐善 让功德不朽 / 215

结语 / 233



第三章 老子

导言 / 236

第一节 何为道德 / 239

第二节 尊道贵德 / 250

第三节 保德立身 / 265

第四节 以道处世 / 274

第五节 圣人之道 / 283

第六节 以道治国 / 293

结语 / 308



第四章 庄子

导言	/	312
第一节	化解主体 成为至人	/ 315
第二节	摆脱困境 与物齐一	/ 327
第三节	回归本真 与道相融	/ 347
第四节	全德保真 成其天性	/ 363
第五节	安时处顺 以养其生	/ 375
第六节	斋心勿用 以处人世	/ 380
第七节	不离吾宗 以应帝王	/ 394
结语	/	402

参考文献	/	405
------	---	-----



绪 论

到目前为止，国学还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概念，需要我们在动态中把握它，在发展中定位它。这不能由哪位学者来决定，也不能由哪个学派来决定，而是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由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国学所释放的时代价值来决定。纵观国学发展史就会发现，伟大的传统、开放的精神、现代化转型，才是国学定位的三大标准。

一、国学含义 动态考察

“国学”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内涵和外延差异较大。《周礼·春官》谈到乐师的职责时说：“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对此解释说：“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可见，周代的“国学”是指国立小学。从西汉开始，历代政府普遍设立太学，以实施高等教育，“国学”随之发展成为包括小学与太学在内的国立学校的统称。到了东汉，“国学”又专指太学或国子学。《后汉书·朱浮传》记载，在建武七年的时候，太仆朱浮以“国学既兴，宜广博士之选”建议国家在太学兴起后，要广招博学之士传播学术。可见此时的“国学”还并不是指“学术”，而是指“太学”。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西方文化以席卷之势汹涌而来，许多人担心中国学术消亡，就借鉴日本提倡国学的做法倡导国学。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以“国学”一词称代中国传统学术，以示与“西学”相区别。此后，邓实、章太炎、谢无量、罗振玉等一大批学者或创办报刊，

或建立社团，纷纷加入倡导国学的行列，“国学”用以称代中国传统学术得到了广泛认可。

与此同时，还有两个名词与“国学”并行使用，一是“国故”，一是“国粹”。1910年，章太炎发表《国故论衡》，以“国故”指称中国传统学术，以示与“国新”（国之新学）相区别。钱玄同、刘师培、黄侃等人也使用过“国故”一词指称中国传统学术。对此，1923年1月，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它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思。‘国故’包含‘国粹’，但它也包含‘国渣’。”胡适的这一说法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曹聚仁在《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一文中对此还做了进一步解释：“‘国故’之‘国’，乃专指‘中国’而言，非泛称也。‘故’之义为‘旧’；以今释之，则与‘过去’二字相当。”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章太炎等人所提倡的“国故”，是主张用传统的方法研究传统学术，而胡适等人则主张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来“整理国故”。胡适于1919年8月在《新潮》上撰文说：“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同年11月，他又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

与此同时，邓实、黄节、梅光迪、吴宓等人则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口号积极倡导“国粹”。邓实创办《国粹学报》，并以此为阵地，宣传国粹。1905年2月，黄节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国粹学报叙》说：“国固吾国也，学即吾学也。海波沸腾，宇内士大夫痛时事之日亟，以为中国之变，古未有其变，中国之学诚不足以救中国，于是醉心欧化，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慨为吾国固奴隶之国，而学固奴隶之学也。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看来，邓实、黄节等人抵触西学，并非完全出于对西学的认知，而是出于一种文化情感，同时也是出于一种深沉的忧患，他们担心中国学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不能独立自主，由此可能导致中国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奴隶。

经过一番讨论后，19世纪20年代，大家终于统一了认识，开始普遍使用“国学”一词来概括中国传统学术。蔡尚思在《中国学术大纲》一文中说：“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那就无所偏倚了……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胡适也有类似的说辞：“中国的一切过

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从此各大学所成立的以中国传统学术为研究或传播内容的学术机构或教学机构都以“国学”一词命名。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与此同时，燕京大学、厦门大学、齐鲁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等纷纷成立国学研究机构或国学院系，一时间国学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九一八事变”的一声炮响阻断了中国学术的自我更新之路，学术界开始分化。一部分人投身抗日，放弃了学术；一部分人转向后方，继续坚持研究。后者在国民党败退以后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去了我国港台地区或海外，一部分留在了中国大陆。留在中国大陆的这部分学者，在“文革”中又受到严重冲击。国学的研究几乎断裂。

“拨乱反正”以后，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国民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当生存不再成为人生困扰的时候，人们开始寻找精神的家园。中国的发展虽然得益于西方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的引进，但是能够安抚国人心灵的还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20世纪90年代，一股来自民间的“国学热”开始兴起，一直持续至今，热度不减，而且大有蓬勃发展之势。

时至今日，“国学”的内涵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在学术界尚未对国学做出统一界定之前，广大人民群众早已对国学有了自己的理解，国学似乎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学术，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永恒价值和普遍意义的思想观念、文化底蕴和精神家园，是与外国文化共生并存、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精神。

人民的普遍共识就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学科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学术发展到今天，学科门类越来越多，科目划分也越来越细。传统国学所包含的内容已经被分列到不同的学科门类，比如文学、史学、哲学、语言、艺术、社会、政治、教育、法律等。在这种情况下，再笼统地将国学锁定为中国传统学术，国学就无法与其他门类相提并论。所以要想让国学的概念能够独立存在，就必须赋予它不同于上述学科门类的内容，于是人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支撑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文化基础——中国文化的源头。

二、百家争鸣 儒道胜出



西周初年所制定的礼乐制度，经过几百年的运行，到了东周已经难以为继，出现了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的局面。面对天下失序的社会乱局，有志之士无不积极探索挽救时局、拯救苍生的出路。他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由于观点的不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秦朝统一才宣告结束。在此期间，涌现出许多有代表性的学派，学派之间的互相争论与辩难被称为“百家争鸣”。其实，“百家”只是极言其多而已，参加辩论的学派并未达到一百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只提到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汉书·艺文志》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四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并且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家以闲事听闻娱乐于人，没有自己的独立主张，故而被认为“不入流”，所以只剩九家。

农家的代表人物是许行，主张君民同耕，所述多为务农种地之术，而非治国安邦之道，其学说后世不传。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著《吕氏春秋》，因为它“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因此被称为杂家。严格讲，杂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派。纵横家的创始人是鬼谷子，代表人物是苏秦和张仪，他们的主要言论见于《战国策》。苏秦主张燕、赵、韩、魏、齐、楚纵向联合以拒秦，张仪则极力破坏六国的纵向联合，拉拢六国以事秦，纵横家由此而得名。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与外交活动，尽管他们的活动对战国政治格局和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影响，但他们还称不上思想家。名家以“论辩名实”为主要学术活动而得名，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著作有《公孙龙子》。名家主要以逻辑原理来分析事物，虽然可以称得上是一门学问，但他们所思辨的逻辑或哲学，对政务与时事没有直接补益，也与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不合拍，因此被淘汰出局。阴阳家因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宇宙万物和社会人事而得名，代表人物为邹衍。阴阳家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对立统一的力量，五行（木、火、土、金、水）是构成万物的五种元素。阴阳五行的变化，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与动力。邹衍还把五行的属性引申到人事，将五行与“五德”相对应，提出“五德终始说”，并以此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王

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阴阳学理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虽然深远，但是它在政治伦理上“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的主张与儒家相近，因而无法得到彰显；而它在解释宇宙万物运行规律方面的优势又被天文、历法、气象、地理、医学所分解，所以它的人文影响力相对较弱。于是十家之中就剩下儒、道、墨、法影响较大。

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显学，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墨家学派在当时的影响力。墨家各种主张明确：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内部组织严密：成员地位卑微，能够吃苦耐劳，不怕牺牲，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社会分工明晰：“墨辩”从事谈辩，“墨侠”从事武侠，“巨（钜）子”统领全局。组织纪律严明：“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这个既有组织又有主张的学派发展到秦代就瓦解了。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墨家学派是一个社团组织，在秦朝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体制内，这种组织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第二，墨家学说本身也存在问题。比如，它一方面强调“非命”，一方面又主张“明鬼”，两者之间的冲突难以协调，无法形成统一的理论；另外墨家的“兼爱”理论跟儒家的“仁爱”理论相比，显得有些粗疏。第三，墨家弟子的生活非常艰苦，有才华的士人不愿意加入，导致后继无人。墨翟死后，墨家学派很快分裂为三。至战国后期，只剩下两支：一支注重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科学研究，称为“墨家后学”；另一支则在社会上做游侠。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其先驱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和郑国的子产。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创立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把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加以提炼总结，成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法家主张，经济上废井田，重农业，抑商贾，奖励耕战；政治上废分封，设郡县，立专制，以法治国；教育上，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制度上，反对儒家的“礼治”，强调“法治”，反对儒家的复古，主张改革。法家实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富国强兵，一统天下。法家为“以法治国”提出一整套的理论和办法。这不但为建立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为后代王朝提供了集权体制和法律体系，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思想

一直被沿用至今，对我国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现代法制的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秦朝统一以后，由于实行严刑峻法，过度使用民力，导致秦朝很快土崩瓦解，因此以后历代王朝虽然都在借鉴法家思想的合理内核治国，但在表面上还是把实现王道乐土作为治国理政的目标，推行仁政，施惠于民。这就是所谓的“阳儒阴法”。另外，我国古代人民历来对法家没有好感，加之法家学说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国家制度建设层面，而不是体现在文化价值层面，所以法家思想也无法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文化基础。

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文化基础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充满诗意的生活憧憬，二是自在逍遥的心灵体验。儒家与道家恰好分别满足这两个条件。于是，儒道两家在百家争鸣中夺路而出，一举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魂灵，几千年来，绵延不绝，以至今。

三、双水并流 此消彼长

尽管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包罗万象，但主要还是围绕一条主线展开。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不但贯穿这条学术主线，而且贯穿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

经过百家争鸣，大浪淘沙，儒、道、墨、法胜出，成为一时的显学。秦朝统一以后，以法家思想治国，并通过“焚书坑儒”对其他学说进行清除，法家率先登上了历史的巅峰。可是好景不长，秦朝仅仅维持十六年就轰然崩塌了，以法家为主流价值观的时代也随之结束。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秦朝的残酷统治和秦末的连年战争，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国家经济几近崩溃。统治者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需要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刘邦问政于陆贾，陆贾全面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并给出了解决方案。陆贾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从黄老思想中汲取营养，在《新语·无为》中提出“事逾烦而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的观点，主张“道大于无为”。刘邦采纳陆贾的建议，以黄老之学为治国理念，实

行垂拱而治，以清静无为的方式与民休息。具体措施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社会状况大为改观。至景帝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此时道家彻底战胜了法家，成为汉初的主流价值观，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七十年。尽管黄老之学，是道家学派中的一支，与原始道家有所不同，但其核心部分还是老子的思想，至于黄帝，只是战国学者假托黄帝之名来弘扬道家思想而已。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继位，好大喜功的武帝迫切希望从思想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制度。丞相卫绾趁机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武帝纪》）他的提议立即得到武帝的赞同。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举荐儒生王臧等人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但由于遭到窦太后的强烈反对，未能立即实行。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第二年，武帝把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召集到长安，亲自询问政治改革事宜。儒生董仲舒在策论中说，春秋一统乃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而现在师不同道，人不同论，思想不一，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其建议立即被武帝采纳。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全部罢黜，提拔儒生公孙弘为丞相，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儒生数百人，还批准博士官五十人，选拔精通六艺者担任重要职务。这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从此成为统治中国人民两千多年的正统思想。

随着东汉政权的瓦解，统治两汉四百多年的儒家思想也开始凋零，士大夫对两汉时期的三纲五常等陈词滥调普遍感到疲惫厌倦，为了寻找精神栖所，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老子和庄子。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相聚竹林，以《老子》《庄子》《周易》（时称三玄）为话题，谈论玄道，号称玄学。玄学是道家之学在魏晋时期的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所以又叫新道家。玄学作为魏晋时期的思想潮流，一直持续至宋代中叶。虽然在魏晋时期还不能取代官方儒学的正统地位，但是玄学是除儒学以外唯一被定为官学的学派。

公元67年前后，佛教传入中国。中国学者刚开始翻译佛典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佛教的真谛，往往比对中国本土的道家学说。直至鸠摩罗什、真谛等高僧翻译经典时，佛学真义才逐渐清晰起来。到唐朝的玄奘法师去天竺数十国取经，取得